

西亚非洲的治理问题

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根源

王 建

摘 要：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曾经创造辉煌灿烂的伊斯兰文明。但在历史演进中，中东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历史文化积淀逐渐显露出其消极面，尤其是伊斯兰教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延续千年的教派矛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存在着先天缺陷：国家认同缺失或不足，中东国家缺乏地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世俗和伊斯兰教两种秩序观的长期斗争，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造成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和恐怖主义的肆虐，等等。这些缺陷导致无论是中东国家的内部治理，还是中东的地区治理，皆陷入困境。以扬弃的辩证方法对待伊斯兰文化的历史积淀，抛弃历史包袱，最大限度地减少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对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的影响，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是破解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东；治理困境；地缘政治；国家体系；历史人文

作者简介：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5-0074-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人文因素、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构成了地缘政治学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所谓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地缘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其与“政治”互动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影响该国家或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自瑞典政治学家、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学形成了诸多理论流派,其理论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丰富,视角日益多元。这些理论流派从对地理环境的单纯分析,扩大到把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人文特点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其在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传统地缘政治学突出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视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为国家权力所依赖的稳定因素。^①近几十年来,特别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历史人文因素在地缘三要素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从历史人文因素的视角探讨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根源。

一、中东成为“破碎地带”的主要因素

对中东地区而言,居于其地缘政治三要素首位的是地理位置。广义上的中东是指“两洋三洲五海”之地,自古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和陆路交通要冲,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其次是自然资源,中东在自然资源上呈现两极分化,一是部分中东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极为丰富,二是不少国家的淡水和耕地资源十分稀缺;最后是历史人文因素,中东是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发源地,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最为活跃、民族往来和更替最为频繁、宗教影响最为深刻的地区。在中东地缘三要素中,历史人文因素对政治的影响绝不亚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甚至高度强化了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政治的影响。历史人文因素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对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故而需要对其秉持扬弃的态度。中东历史人文因素最主要的特征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积淀。本文将主要围绕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的负面影响展开讨论。

伊斯兰文明的形成和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在中世纪对欧洲古典文明的保护与继承,为欧洲的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150页;[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件。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相较于西方的落后与封闭,中东伊斯兰文明在与伴随西方殖民势力而来的西方文明的交往与碰撞中,其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对政治的影响愈益凸显。中东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教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复杂教派矛盾;二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殖民入侵和强权政治干涉造成中东穆斯林严重的挫败感,以及因此催生出的各种极端思潮;三是在地区各民族长期交往中形成的民族矛盾。

19 世纪初,中东地区开始遭到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在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中东“处于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总的形势之下”^①。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促进了中东民族意识的觉醒。20 世纪初,青年土耳其革命和波斯立宪运动掀开了中东地区民族觉醒的历史新篇章,开始了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的历史进程。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次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中东形成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除巴勒斯坦外)。

但是,中东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中东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融合的自然结果,而是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根据一系列条约划定而成,其中尤以《赛克斯—皮克协定》最为著名,将欧洲的主权国家概念移植到中东地区,仿照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起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西方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中东地区各民族居民“对于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依然淡漠”^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种强行施加的机制将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纳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③,但是“这种边界领土划分很少考虑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口自然聚居因素,而是英法根据各自利益需要,任意划分的结果”^④,有的甚至是“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这种无视中东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做法,使得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常年的边界纠纷、民族矛盾、教派冲突。在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和地区治理方面,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不仅没有被弥补和克服,反而被不断放大,民族、教派、领土矛盾在域外大国的干涉下,使得中东地区逐渐成为“破碎地带”(Shatter Belt)——“一个被内部冲突撕裂的地区,其分裂程度随外部重要大国竭力想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的干预行为而增加。”^⑤

①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3 页。

② 黄民兴、谢立忱:《战后西亚国家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9 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5 年版,第 134 页。

④ 黄民兴、谢立忱:《战后西亚国家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第 350 页。

⑤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 页。

二、中东陷入治理困境的表现及根源

“治理理论”是近年较为流行、内容极为丰富的跨学科理论。在国际政治中,根据对象和层级的不同,治理可分为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学界对“治理”一词的定义莫衷一是,有中国学者将“治理”定义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①。实际上,一个国家若要实现长效治理,仅凭权威是不够的,必须依赖全体社会成员价值观的认同,只有共同的价值观方能使民众自觉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并自觉维护国家秩序。一个地区若要实现长效治理,地区各国需要共同承担起地区治理的责任,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构建地区治理的有效机制。但是,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不仅使中东沦为了冲突与动荡相交错的“破碎地带”,更使中东国家和地区陷入了治理困境,导致地区国家难以扭转政治严重失序的状况。

(一) 国家认同的缺失严重制约中东主权国家内部的有效治理

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是外部力量干预的结果,而非历史自然发展和融合的结果,独立后的中东民族国家在整合国家、培养国家意识、凝聚国家力量上面临民族和教派矛盾的多重困扰。由于欧洲殖民主义在划分势力范围时,很少考虑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口聚居因素,或者是出于“分而治之”政策而有意为之,其结果是中东民族国家普遍为多民族、多教派共存的国家。在中东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中,执掌政权的主体民族往往对非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过度膨胀,导致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间的民族矛盾加深,少数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强烈。同样,由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的历史积怨甚深,导致掌握权力的教派与被统治的教派之间矛盾加剧,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教派冲突甚至教派屠杀。复杂而激烈的民族和教派矛盾严重制约了中东国家的有效治理。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对国家的忠诚是国民的终极政治忠诚,但对中东穆斯林而言,身份认同与政治忠诚则要复杂得多。在部落、国家、宗教等范围渐次扩大的组织结构中,相当多的穆斯林对部落与宗教的忠诚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在他们心目中,“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②。中东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中东

^①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现代主权国家的大多数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当今世界即便是欧洲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进行国家治理,并不是要实现民族和教派的统一,更不是以强权推行统治集团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而是通过培育全体国民的价值认同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进而达到国家整合、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实践证明,中东国家恰恰在国家整合、培养国民意识、构建共同的价值体系上出现了严重问题。第一,统治集团本位主义严重。在中东许多国家,无论是世俗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长期以来统治者依靠专制制度或强权政治,或以主体民族压制少数民族,或以统治集团的教派压制其他教派。掌握政权的教派、家族或部落势力享有国家几乎所有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并通过强化教派和部落意识来进一步巩固自身利益。第二,中东国家普遍缺乏民主。从 20 世纪初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一直到中东剧变前的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强人政治成为中东共和制国家的普遍现象,而实行君主制的海合会六国和摩洛哥更是由王室掌握权力,把国家财富视为家族财富,导致专制和腐败盛行。中东的政治强人依靠强力手段维护了政权,维护了社会基本稳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未能创造一套用以指导其继承人的价值体系”^②。第三,部分中东国家民生改善进程缓慢。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非石油输出国家,多年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失误,造成经济指数虽然有提高,但由于腐败盛行,造成社会分配极为不公,特权阶层占据了社会大量财富,导致社会积怨颇深。第四,政府推行的西化与世俗化道路与民间的伊斯兰信仰激烈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尤以埃及、突尼斯和土耳其最为典型。

国家治理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最终实现善治。在中东,由于缺乏共同价值体系认同,强人政治治理下的国家表面上看起来稳定,实际上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民族和教派矛盾,扩大了社会不公,难以实现满足公共利益需求这一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一旦发生强人政治倒台或外部势力的干涉,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国家政治和社会失序的治理困境。

(二) 中东国家缺乏地区治理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导致中东地区治理的困境

地区治理的目的是基于平等和协商原则在地区国家间构建有效机制,维护地区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90 页。

^②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年版,第 258 页。

秩序的稳定,最大限度地满足地区国家的利益需求。在中东地区,复杂而尖锐的教派、民族、边界矛盾使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能力主导地区治理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即便是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几乎很少在关乎地区治理的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迄今没有在国家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来进行地区治理,维护地区安全,导致中东国家缺乏地区治理的能动性。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中东国家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域外大国,将中东地区治理权交给域外大国,因而丧失了地区治理的主动性,这反过来为域外大国干预中东地区事务提供了便利。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早已使其成为域外大国的觊觎之地,域外大国通过结盟或准联盟手段将中东国家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之中。获得中东地区治理主导权的域外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盟友利益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压制中东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维护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稳定,形成了所谓的“霸权稳定机制”。

“霸权稳定机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稳定,但它也给中东陷入治理困境埋下了祸根。域外大国毕竟是为其利益和全球战略而来,当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利益下降或因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而出现干预意愿或能力减弱时,就会设法减轻或推卸其对中东地区治理承担的责任,“霸权稳定机制”也就随之失效。美国小布什政府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打破了旧的中东秩序,但新的中东秩序在其任期里内并未建立起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变化,使美国对中东的投入大为减少。中东国家由于失去了依靠以及缺乏地区治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不仅难以达成地区治理的共识,反而出于各自利益,相互猜忌甚或相互为敌,使中东历史人文因素中的消极面迅速膨胀,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失序状态和治理困境。

(三)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教俗矛盾加剧了地区治理的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逐渐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体系,但与欧洲国家构建主权国家体系的背景不同,中东国家是被动接受了欧洲国家移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非像欧洲国家经历了思想启蒙、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尽管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改革派认为,宗教是穆斯林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倡导宗教远离公众生活,建立一套世俗的体制,“从城市、建筑到官僚机构,从公司管理到学校教育,从政治到文化,所有方面概莫能外”^①。但百年来的

^①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实践表明,以西化为目标的改革理想与中东国家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距,接受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城市精英与受传统宗教思想影响的大多数穆斯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方面是接受并实施西方世俗世界观的少数精英,另一方面则是并不认同世俗观念和价值的大多数穆斯林民众”^①。更为重要的是,程序与体制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观念与文化的世俗化,“土耳其人心灵与头脑中的伊斯兰教至今未被土耳其民族主义所取代”^②。

无论是土耳其、伊朗,还是埃及,近现代的改革运动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始终根深蒂固,坚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虽数度遭到镇压,但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出现了旨在复兴伊斯兰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通过复古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伊斯兰复兴运动。1928年,哈桑·班纳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针对西方文化对中东地区的不良影响,抨击世俗统治者骄奢淫逸、道德沦丧、治国无术,提出用伊斯兰教义取代世俗的民族国家体制,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创建一个基于伊斯兰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③。1949年班纳遭暗杀后,赛义德·库特卜对伊斯兰运动做出极端化的解释,认为“伊斯兰教是给予人类唯一真正自由的普适体系——不受他人或人为理论统治,或者说摆脱了‘那些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和国家、地区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低层次的结合关系’”。^④库特卜将伊斯兰教的当代使命归结为“推翻所有这些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严格按字义践行《古兰经》,乃至最后在全世界践行《古兰经》”^⑤。这种纯粹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强调,对国家的忠诚偏离了真正的信仰,因而世俗国家以及由此构建的国际关系均不具有合法性,其目的就是彻底颠覆中东乃至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秩序,并以伊斯兰秩序取而代之。尽管伊斯兰秩序观在广大穆斯林中极具感召力,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为代表的世俗秩序观一直在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世界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新独立的中东国家被卷入到现代化的洪流中。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运动已在中东地区全面铺开。^⑥但是,在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伊斯兰秩序观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世俗秩序观的挑战不仅没有减弱,

①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9页。

② [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第258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145页。

④ 同上,第147页。

⑤ 同上,第147—148页。

⑥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页。

反而愈演愈烈。这是因为,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一系列挫败,严重的挫败感使广大穆斯林对国家发展道路产生了疑虑,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对广大阿拉伯国家而言是“灾难”之年,也是现代中东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对阿拉伯和穆斯林的自尊心、认同感和自信心都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①。无论是主张西化的世俗精英还是恪守传统伊斯兰教的人都在反思,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阿拉伯国家走过数十年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何最终还是遭遇惨败?广大穆斯林在批判和反思西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对中东地区本土文化重新有了新的认同,“这种认同更多地植根于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伊斯兰传统和价值”^②。于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伊斯兰教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一种自足的意识形态的信念,对世俗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种有效的替代”^③。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了新一轮高潮,进一步加剧了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两种秩序观的斗争,使地区实现有效治理更为困难。

(四) 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催生了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蔓延

在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形成的进程中,伴随着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在中东地区被裹挟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相伴而生的各种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也对中东国家和地区的有效治理构成了严重威胁。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反思中东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挫折时,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将原因归咎于域外大国对中东国家的干涉和掠夺以及非伊斯兰文化的入侵,其中一部分人思想激进人士,逐渐走上了以暴力手段对抗外部势力干涉和掠夺的道路。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阿拉伯国家一些极端分子奔赴阿富汗抵抗苏联,而美国对这些抗苏极端分子给予了大量军事援助,最终催生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基地”组织的打击目标转向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世俗腐败政权”,并试图建立“纯正的伊斯兰国家”。“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打破中东旧有地区秩序的同时,却未能建立起新的地区秩序。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为恐怖主义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最终酿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内战兴风作浪。恐怖主义的泛滥对中东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地区秩序和地缘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也是中

① [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13页。

② 同上,第14页。

③ 同上,第15页。

东陷入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

三、中东国家和地区摆脱治理困境的挑战

2010 年底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剧变引发了中东多国局势剧烈动荡,使建立在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基础之上的国家和地区治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东地区历史人文因素中消极面的大爆发是中东陷入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消弭历史人文因素中的消极面,使中东摆脱治理困境,实现由乱到治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一) 弥合民族和教派矛盾是中东国家实现有效治理面临的长期挑战

中东国家通过构建全民认同的价值观体系来弥合民族和教派矛盾,实现国家整合,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面临四大挑战。其一,在一个国家内部弥合不同民族、不同教派、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分歧,形成全民认同的价值观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中东剧变后,中东呈现出碎片化加剧的态势。中东剧变初期,世人以为突尼斯和埃及民众争取民主和改善民生的呼声将掀起中东新一轮民主化高潮,翻开中东历史新篇章。但事态发展偏离了这场运动的初衷,反而引燃了部族和教派冲突,导致部分国家严重失序,尤其是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冲突频仍,陷入了各派武装割据的局面,更遑论国家秩序的重建。其三,在埃及、突尼斯、土耳其等国,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两种秩序观仍在激烈较量。在埃及,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强力打击;在土耳其,以总统埃尔多安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正在推行一系列更具伊斯兰色彩的内外政策。其四,构建一个民主且稳定的政治制度,非朝夕间可以完成。因此展望未来,中东国家实现有效治理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 域外大国的战略调整使中东的“霸权稳定机制”陷入“区域性多极不稳定状态”

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强调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中东问题,寻求与大国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当中东地区因剧变陷入严重失序时,美国未能像以前那样成为地区秩序重建的主导者,进而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动荡秩序。特朗普上任总统后秉持“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理念,对中东事务的关注与投入仍将有限。美国在中东实施收缩战略是由其长远国家利益决定的,即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以“美国优先”的原则实现美国重新强大,保证美

国的安全。如此一来,在全球能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建立在“石油换安全”基础上的战略思维已然过时,中东地区长期依赖于美国的“霸权稳定机制”亦即失去效力。

按照奥巴马的设想,中东大国应该承担起维护地区秩序的责任,尤其是“沙特应该与伊朗共处”^①，“它们需要找到在该地区共存的有效方式,缔造一种冷和平”^②。但事与愿违,在美国的中东传统盟国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表明其已然放弃了“在陷入持续混乱地区维持秩序的支配角色”^③。这意味着美国将中东地区治理的责任转嫁给中东地区大国,在中东国家未能构建起地区治理机制的情况下,地区权力空间突然扩大,反而激化了地区国家间的矛盾,以前被掩盖的地区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意图被激活和释放出来。

作为中东的地区大国和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沙特和伊朗之间既有尖锐的教派矛盾,又有现实利益的争夺,双方的对抗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变得异常激烈,并形成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两大阵营的严重对立。伊朗与六国达成核协议使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造就了伊朗在中东的强势地位。在沙特看来,这将不可避免地唤起海湾君主国内的什叶派对居于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的不满,从而危及逊尼派的统治地位。为对抗伊朗的势力扩张,沙特改变了其在幕后操作的传统外交风格,走上前台,与伊朗进行正面对抗,采取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阿拉伯国家联军干预也门内战、处决国内什叶派领袖等激进做法。沙特和伊朗的对抗使中东剧变以来的多个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并在叙利亚和也门上演了代理人战争。

在两大阵营的较量中,什叶派阵营的团结相对更紧密,逊尼派阵营则要松散得多,土耳其、埃及等具有地区影响的国家也在谋求各自利益,它们与沙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矛盾,而与伊朗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利益联系。因此,被各种矛盾和利益纠缠在一起的中东国家难以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在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机制”失效后,中东陷入了地区大国竞争的“区域性多极不稳定状态”,而且由于诸多矛盾难以化解,这种“区域性多极不稳定状态”将长期化。

(三) “伊斯兰国”组织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将成为中东地区治理的重要障碍因素

2014年6月29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国”,这在某种程

^① Martin Indyk, “The End of the U.S.-Dominated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tlantic*,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03/obama-middle-east-policy/473529/>, 登录时间:2017年4月10日。

^② 《奥巴马提议沙特与伊朗以“冷和平”方式共存》,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3-11/7793089.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4月6日。

^③ Martin Indyk, “The End of the U.S.-Dominated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度上意味着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伊斯兰秩序观从理论走向了极端另类的实践。“伊斯兰国”组织在短时间内构建起一整套覆盖行政、宣传、组织、司法、武装、财政、税收等“国家”机器。“伊斯兰国”组织从多个方面对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构成了严重冲击。首先,该组织建立的“准国家化”实体严重冲击了中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根基。国家体系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而国家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拥有领土,即地理学意义上界定的边界。“伊斯兰国”组织横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部分领土和边界,并在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建立了以“省”命名的分支机构,如“西奈省”、“利比亚省”等。“伊斯兰国”组织的远期目标是要终结中东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赛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的中东现有政治版图。其次,“伊斯兰国”组织冲击了中东国家本就非常脆弱的国家认同。拥有一个人民效忠的政府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伊斯兰国”组织为实现其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强调现存的国家 and 组织都不具合法性,号召全体穆斯林向“哈里发”巴格达迪效忠,以对伊斯兰教的效忠取代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最后,“伊斯兰国”组织加剧了部分中东国家的碎片化。在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中,一些原本在中东受到压制的民族问题显露出来,尤其是库尔德人问题。库尔德人成为抵抗“伊斯兰国”组织扩张的重要力量,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同时,其实力和影响力也迅速扩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了库尔德人的军事力量和自治区,这对伊拉克和叙利亚未来的国家重建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是维持统一还是被各种势力分割,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当前,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力度,其控制的领土大幅缩减,实力受到重挫。但是,中东产生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的土壤尚未铲除,即便“伊斯兰国”组织的实体被彻底摧毁,但该组织宣扬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仍难以根除,其对中东地区治理的威胁仍将长期存在。

四、破解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中东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是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何从凯末尔革命以来中东百年现代化进程没有消除这些历史人文因素中的消极面?这需从中东百年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寻找答案。

历史上,中东地区曾诞生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并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以来,欧洲通过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社会发生了革命

性变革。在欧洲,启蒙运动解放了人的思想,宗教远离了政治,解放了人性。马克思曾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则让宗教自由行事时,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做公共事务而当做自己的私人事务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①。正是思想的解放使欧洲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继而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是,中东地区是被殖民主义者裹挟到现代化的洪流中的,由于缺乏思想启蒙的准备和推动,在中东走上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同时,未能进行相应的社会变革,宗教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其结果之一是那些走过数十年世俗化道路的国家仍无法摆脱伊斯兰主义的严峻挑战。

为什么中东国家的宗教与政治没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分离,反而在一些国家是越来越紧密呢?这是中东历史发展进程和现实地缘政治斗争所决定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东国家未像欧洲那样经过与中世纪决裂的思想启蒙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依靠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来实现现代化。不仅如此,沙特等国的王室利用雄厚的石油美元满足了国民的利益需求,弱化了国民对社会变革的要求。从现实地缘政治斗争看,沙特和伊朗作为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代表,领导各自阵营,将宗教和教派意识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动员工具,使之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被进一步强化。

正是宗教思想和教派意识的强化,广大穆斯林对宗教的忠诚深刻地影响着其身份认同,即对宗教的忠诚超越了对国家的忠诚,使中东国家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国家整合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广大穆斯林的失落感和挫败感更加使其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只能从辉煌的历史中寻找慰藉,以回归伊斯兰教对抗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②

诚然,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东国家和地区陷入治理困境负有重要责任,但这毕竟是外部客观因素。对中东国家和地区陷入治理困境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内部因素,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和尖锐的教派矛盾等中东历史人文因素中的消极面是主观因素的重要内容。因此,破解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就要从中东国家的主观因素入手,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历史人文因素的消极面对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的影响,以扬弃的辩证方法对待伊斯兰文化的历史积淀,抛弃历史包袱,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五、结语

导致中东国家和地区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人文因素中的消极面的影响是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很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在反思中东现代化进程,大胆提出了与思想解放相关的伊斯兰教改革问题。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尔昆(Muhammed Arkoun)认为,以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欧洲哲学家在十七世纪将哲学思想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精神和思想上的大解放使欧洲开始赶超伊斯兰世界,而在伊斯兰世界,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国家,至今尚未跨出这一步。他认为,“阿拉伯人必须经历这一阶段,以便有史以来第一次运用独立的理性——我指的是独立于宗教、神学既定价值之外的理性,他们应该尝试走出樊笼(或者是自我之茧)、获得自由的滋味”^①。埃及总统塞西更是前所未有地以阿拉伯国家在任元首的身份呼吁:“我们需要一场宗教革命……我们需要一场自我革命,一场意识和道德革命以重塑埃及人。”^②可以说,中东各民族、各教派只有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本着以妥协求生存、以共存求发展,方能实现中东的由乱到治。这是破解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赵 军)

^① [法]穆罕默德·阿尔昆:《阿拉伯学者面对现代化的文化反思》,薛庆国译,载《回族文学》2005年第6期,第21页。

^② Dana Ford, Salma Abdelaziz and Ian Lee, “Egypt’s President Calls for a ‘Religious Revolution’,” CNN, January 6, 2015, <http://edition.cnn.com/2015/01/06/africa/egypt-president-speech/index.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月16日。